

生活道德教育的回归与重建

唐汉卫

[摘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和百年前的生活教育相比，近十年来的生活道德教育可以视为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中国教育的又一次自我确认和选择，其意义当然也超出了教育的范畴，具有更大程度的解放思想、尊重现实、启示未来、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价值。生活道德教育的未来在于文化自觉和重建社会，二者关系密切，不仅从根本上关系到生活道德教育的前途，而且也是中国社会转型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生活道德教育；历史的角度；文化自觉；重建社会

[作者简介]唐汉卫，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反思道德教育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倡导道德教育向生活回归业已成为理论界研究的一个潮流，并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中小学的新课程改革。鲁洁先生曾明确把“回归生活”作为理解《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新课标的根本线索，在新课标的指引下，无论是新教材建设、课程资源开发，还是新课程的课堂教学与评价等具体实施环节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线索和理念。笔者也是“道德教育回归生活”这一理念的积极倡导者，曾撰写了《生活道德教育论》一书和系列论文，并参与了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一些具体的实践层面的工作。在参与这些工作的过程中，笔者充分见证了“生活道德教育”的魅力和影响力，它不仅契合中小学生的道德发展和道德教育的需要，也确乎推动了道德教育的改革，提升了道德教育的实效。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来自实践、实施层面的一些困惑、困扰和矛盾也在不断涌现，一次次叩问和彰显出需要进一步澄清或明确回答的理论性问题。比如：如果不止于从方法论的，出于对脱离生活的道德教育批判的角度，而是基于更加长远、更加宏阔、更富有建设性的角度，如何看待生活道德教育的意蕴和价值？生活道德教育未来应该走向哪里？在生活道德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如何处理和看待一些二元对立的矛盾——一元与多元、传授道德知识与生成道德智慧、忠实教材与教材创生，以及在实施中涌现的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把这些问题讲清楚，进行基本的理论自觉，既是生活道德教育自身完善的需要，也是开展实际工作的需要。基于这种考虑，结合十余年来参与生活道德教育的实践、体会与反思，笔者尝试对以上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本文所要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生活道德教育。

一、把生活道德教育放在历史的脉络中去考察

从历史的角度，就意味着把生活道德教育放在历史的发展中去看它的来龙去脉，亦即对生活道德教育的认识，包括生活道德教育的提出、开展、内涵和真正的所指、未来发展的趋向以

及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等应该从它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去认识，而不应该仅仅从教育、道德教育自身的角度从某种哲学思潮的影响或某些学者的因素等角度来认识。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种教育思想、观点的提出都能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影响，任何单一角度的归因都可能是片面和狭隘的。而且，对这种思想仅仅作出单一化的价值评判可能也有失公允，但是，这都不妨碍我们从某一角度对某种教育思想、观点进行透视和分析，并且限于这种角度和范围内对之进行必要的评说。所以，尽管教育发展有自己特有的逻辑，回归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为道德教育的“否定之否定”，生活道德教育的理论建设也确实吸收了某些哲学思想和受到某些个体的推动。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生活道德教育的提出、实践确有其合理性、必然性，其他几个影响因素毋宁说也是出于历史之中的动态相合。同样，生活道德教育在实践过程中也具有不可避免的瑕疵和困惑。只有置身于历史之中，我们才能看清楚它的未来。

如果把教育的变革放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环境、大趋势、大节奏的语境下来看待，那么不难发现，百年来中国教育、道德教育在各个时期的发展主题、所遇到的困惑以及选择都是与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的需求、社会生产和生活状况紧密相关的。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无需详述，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开启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世俗化、人本化的历程，而这一切，都需要经济生活的变化为基础和前提。十年前，正好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国家提出市场经济政策并实施了十年，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国家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无疑是颠覆性的，与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初期的困惑、遮遮掩掩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或蕴含的许多现代性价值观，如个人自主、平等、自由、权利和利益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深入人心，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和人们生活中的价值选择。世纪之交，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时代变了、生活变了，而且这种变化也明确得到了来自官方的、国家意志的认可，“以人为本”成为新时期的执政理念而反观当时的学校道德教育实践，很大程度上还沉睡在知识化、意识形态化、成人化以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观念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归生活，回到当下的、儿童的、世俗的、以现代性价值观为取向的世界才如决堤之洪水，一经提出便得到广泛的回应。所以，回归生活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也可以看做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之后社会的演进在教育上的体现，而绝不是教育内部的逻辑推演和概念游戏如果与 20 世纪初的生活教育相比，就会发现历史有时有着某种程度的“重演”。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面对社会的变革，在当时种种新思潮、新思想的影响下，教育界的有识之士直陈旧时代的旧教育之种种不足，提出教育要面向新生活，如陶行知先生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生活教育的主张他曾把生活教育的特质概括为：“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在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当时历史因素所起的作用。21 世纪开始，“生活”再一次进入教育理论界的

视野，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经历了百年的风云变幻，社会历史步入“常态”和“正途”之后，更高历史阶段的教育的又一次自我确认和选择。因此，这种选择就有了更高层次的历史性的意义，如果这种选择能够持续下去，那么，不仅对于教育、对于中国的现代化都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因为，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不再仅仅是某种工具和单纯的附属品——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开始真正为人的发展、为社会的现代化服务，开始展示一个正常的、期盼已久的时代的精神价值——尽管这个时代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历史毕竟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因此，生活道德教育的提出、实践是符合历史的、时代的产物，它不仅仅是从教育学方法论的角度对知识化、概念化的道德教育的批判和反动，也不仅仅是源于本体论的角度对于道德、道德教育和生活之内在联系的逻辑沉思，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历史意味。当然，从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来看，生活道德教育在新世纪的登场也不失合乎逻辑的一面。改革开放后，上世纪80年代在教育界掀起的是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其中萌动着对各种教育异化和蜕变的反省，呼唤着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肯定；90年代市场经济政策提出以后，以人为本、主体性教育理念则逐渐深入人心，而人本化、主体性不可能是虚空的，而是实实在在展示在人的生活之中，特别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运作和社会生活之中；之后，市场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观念有了进一步提升，特别是思想文化氛围有了进一步的宽松和解放之后，“生活”则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历史的前台、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回归生活”，其意义可能就溢出了教育的范畴而带有更大程度的思想解放、贴近现实、昭示未来的意义。这并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发掘了其历史价值，在教育与社会、当下与未来的互动关系中赋予了其更为长远的历史责任

由是观之，今天的生活道德教育绝不仅仅意味着对道德教育之形式上的转换或仅从一般意义上、空泛的意义上推崇生活之于儿童道德发展和道德教育的意义和价值而是从历史脉动、社会大趋势的角度看，在道德教育的实际内容和所推崇的价值取向上也应该是有所指的，这就是由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所推动、带来和确认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性价值观，这理应成为当今生活道德教育的重要选择。

二、回归生活的道德教育需要理论和实践中的文化自觉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生活道德教育无论从概念建立、逻辑架构、理论预设还是从现实运作来看都不是自足的，都需要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不断发展、完善和更新。正如新世纪的生活教育和百年前的生活教育不同一样，每个时期的“生活”都要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赋予其新的富有时代性的内涵。事实上，随着生活的发展变化和生活道德教育的实际开展，许多现实的问题日渐浮现出来，回归生活的道德教育仍然面临种种困惑现实的生活，特别是处于急剧的全球化、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生活，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并非路向明确、脉络清晰、

秩序井然，而是处于多元、杂乱甚至是虚无的状态。因此，回归生活以后的道德选择和道德教育，马上就会遇到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问题，即到底应该过哪种生活。或者说，脱离生活的、神圣的、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化的道德教育可能是无效和起到负面效果的，但真正融入生活以后的道德教育也会遇到诸如哪种生活是值得过的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各种不同生活之间的不同甚至冲突但是，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性价值观并不能涵盖一切，这其中除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之外，即便是现代性价值观本身，可能也需要随国情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做出适当的调适这样，文化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因为，如梁漱溟先生所语，“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如果说在生活道德教育提出并实施的头几年，文化和价值选择的迫切性问题还并不是特别明显，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市场经济负面价值的充分展现和生活中的道德事件、文化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生活怎么了？就是要儿童回归这样的生活吗？作为一个群体、社会和国家，除了要不断发展、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之外，是否还要有精神、文化、价值意义上的考量？如果有，这种考量、判断、抉择又是什么呢？总而言之，“文化自觉”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的时代性课题，也是生活道德教育所面临的时代性课题。

早在 2003 年，鲁洁先生就以敏锐的眼光提出了教育的文化自觉问题。另外，笔者在《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和《全球化、文化变革与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等著作和相关论文中也对道德教育的文化自觉所关涉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理解，此处不再详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文化自觉特别是道德教育的文化自觉是一个长期、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曾长期受到遮蔽和歪曲。今天，道德教育的文化自觉仍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靠一两次运动、简单的行政指令等就能解决，应抛弃那种激进主义、理想主义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实践，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育、法治意识的提升、由教育普及、网络普及而带来的民众素质的提高等，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基础和历史环境(尽管这种环境仍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不足。由于道德、道德教育和文化间的根本性、基础性的联系，文化自觉之于道德教育的改革、生活道德教育显得必要而迫切，它关乎道德、道德教育的现代转型能否真正取得成功、往大处说，也关系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命运—因为它从深层次上标识着现代化的方向。文化自觉既需要理论上的积极探索，也需要实践中的不断尝试令人欣喜的是，中小学教育实践中的文化意识也已逐渐显现，尤其是在道德教育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学校根据自身的实际开始有意识地提倡某种文化，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化选择、反思和创造意识，一定的文化自知、自信。尽管这种自觉尚显粗浅，有的则是盲目跟风，但毕竟风已吹起，学校发展、教育改革已逐渐从外在的表层转向更根本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层面。

三、文化自觉的实现需要“重建社会”

回归生活的道德教育需要理论和实践中的文化自觉，而对于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认识到“重建社会”的意义。社会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相对独立、自主的领域，其运行的主导性逻辑不是权力和金钱，而更多的是道德和文化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社会生活才是文化的母体、土壤和依托，是个体道德成长和道德教育的不二法门。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文化是神，社会是形，文化是用，社会是体”，二者水乳交融，不可分割。什么样的社会支撑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文化也内在地引领和规范着什么样的社会。当社会萎缩、不存在了，文化也就没有了存身之地。传统文化道德以传统的社会为依托，传统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有变，然而传统社会相对而言独立于皇权之外，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内核，以士绅群体为代言人和主动的担当者。绵延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和伦理诉求正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存在才得以存在、今天的文化自觉、道德建设不能主要依赖行政力量、市场法则，具体而言，就是以现代公民社会为载体才能实现。

笔者在此之所以提出重建社会，原因有二：一是当前社会生长、发育的空间太小，需要扩大和建设社会领域，真正给各种社会组织以应有的生长空间、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生了“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小农经济逐渐解体，政治力量和国家管理方式发生变化，现代工业经济、市场经济慢慢登场，原有的家庭结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等等也慢慢随着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发生变化，这样，传统社会只能走向没落建国后，党和政府对整个国家采取计划式集中管理模式，意识形态氛围浓厚，民间的自主、自治力量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却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民间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后，市场逐渐发育，成为了笼罩在社会之上的另一种力量，金钱和权力的逻辑渗透到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社会组织要么依赖和从属于政府、成为半官方的组织，要么依赖于市场和企业，成为谋利的组织、市场经济的一个链条，要么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特点，而文化和道德的存身之地在逐渐变小。所以，重建社会也就意味着不能再维持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也不能处处都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用经济的尺度衡量一切，政府和市场应各自退回到应有的领域，各就其位，各得其所，把属于社会领域的事物、事情、活动等交还给社会。这也是当前新一届政府所大力提倡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改革所产生的困难就在于改革者总是担心社会力量的兴起，不敢真正赋权于社会，包括媒体和非政府组织。”重建社会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需要更新，当前的社会建设不能再恢复和重建原有以小农经济、以宗法和血缘关系、以人身依附等为指征的社会，而应该建设以现代公民社会的普遍特征为参照一即以现代大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现代契约关系为核心，以有限政府、法治社会为特征，以自由、民主为价值取向，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实践为依托的“中国式”的现代公民社会，这就需要传统的社会

予以本质意义上的更新和重建。现代道德、道德教育所要进行的文化自觉和回归的社会生活，当是以现代公民社会为依托、以公民文化为重要内容、以公民生活为指向的社会生活。

重建社会的意义当然不止于一个国家和教育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建设，它还有着更加深远和广泛的意义，但文化自觉的确需要重建社会，需要在自主的、健全的、充分发展的社会空间内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只要社会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相对于国家(state)的权力而言，价值观念的变迁也自然会找到它自己的轨迹”。那么，如何重建社会，既需要国家从体制上给社会松绑，给社会以发展、成长、壮大的空间，也需要现代人具有积极主动的社会关怀和参与意识，不断提升公民素质、文化和道德素养，而这种素质恰恰正是在社会参与、社会关怀和社会活动中培养起来的，这也正彰显了生活道德教育的真义。对于道德教育而言，回归社会生活，不是放任自流、积极迎合某些变相、非常态的社会生活，而是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批判反省的眼光、开放包容的心胸去主动地建设社会生活。具体来讲，在生活道德教育的实践中，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的各种健康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需要重新审视学生团体、各种学生自治组织的状态和作用，需要在大力提倡和维护现代公民价值观的基础上鼓励学生进行大胆的开拓与创新。毕竟，中国式的公民社会和文化自觉是百年来未竟的事业，除了在实践中探索和创造，别无它路。

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笔者对生活道德教育的再认识，那就是“历史的角度”、“文化自觉”和“重建社会”，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的角度是强调从更宽广的社会历史环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活道德教育的产生和演变，强调从社会的物质生活基础、用动态的观点、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必然也会得出合乎历史发展和逻辑的结论，即文化自觉与重建社会文化自觉则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对生活道德教育精神内涵和指向的追问，是生活道德教育得以进一步拓展、深化的必需，也是未来长期面临的历史任务。重建社会则是文化自觉得以实现的组织依托和必要途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文化自觉就只能是在人们脑海中的空想，永远有名无实，因为文化自觉最终是在各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创造、实现和体现其价值的。

参考文献：

- [1]陶行知.生活教育之特质[J].生活教育,1936,(2).
-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0.
- [3]鲁洁.应对全球化:提升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
- [4]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09.
- [5]李克强谈机构改革: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做好的就交给社会[EB/OL].http:

//www.ohinadaily.com.cn/nqgj/jryw/2013-03-17/content.8518494.html.

[6] 郑永年. 未竟的变革[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258.

[7] 余英时. 现代儒学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128.

A Reconsideration of Life Moral Educa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bstract: Life moral education of this decade could be regarded, in contrast to that of 100 years ago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s another process of self-confirmation and self-selec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a higher stag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us, its meaning goes beyond the category of education and lies in the emancipation of mind, esteeming of reality,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future. The future of life moral education depends on two closely interrelating factors, i.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reconstruction, which are the fundament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prospect of life moral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vital element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life moral educa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social reconstruction